

民族存亡催生瑞安现代金融业

俞象川名亚文,业界的人都叫他象川,亚文这名字反倒生疏了。

1911年,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祖父俞黼唐是一位饱学的塾师,父亲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拔贡。他只读了一年初中,就辍学去永源钱庄当了一名学徒。这年,他才14岁。由于他聪明好学,诚实能干,深得老板何启奇的赏识,三年学徒期满,被提拔为钱庄掌柜。次年,又被以生产莘塍五香干闻名遐迩的丰和酱园老板徐远山看中,被聘为兼职会计。

飞云江畔的瑞安,地处海滨,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工商业比较发达,历来是泰顺、平阳、文成三县物资的集散转运口岸,加上其时瑞沪海轮的通航,金融业应运而生。据父亲回忆,民国建立以后,瑞安开始有大规模的私人钱庄出现,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工商界中一些有信誉的商家先后开办了益泰、同一、瑞康、永元、联康、联益等多家中等规模的钱庄,瑞安初步形成了金融市场,现代金融业处于萌芽状态。浙江省地方银行在策划建成全省金融网时,决定把瑞安列为首批发展的对象,为此委托温州支行尽速物色瑞安方面的合适人选,经过多方考察,最终确定了我的父亲。

1935年的仲春时节,年仅25岁的俞象川胸怀救国大志,怀揣写就的《瑞安经济生产调查》一文,随同省行温州支行经理李惠衡来到从未去过的省城杭州,谒见浙江省地方银行总经理徐恩培。双方经过多次交谈,省行对这位青年才俊印象甚佳。十多天后,他受命而归,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省行瑞安办事处的筹建工作。

半年后,浙江省地方银行瑞安办



青年时期的俞象川

事处正式挂牌成立,行址设在小沙巷口,自此,瑞安首个国营银行企业在抗战的炮声中呱呱坠地,时人简称“瑞安地方银行”,我父亲被正式任命为办事处主任。

父亲在他的遗笔《瑞安金融业创建及沿革概述》一文中写道:

“瑞安浙江地方银行于1935年10月成立后,就本县而言,确系新型金融企业,各界颇寄厚望,其经营业务主要是存放款、汇兑等,属工商银行性质。旋即接收县金库业务(即县财政赋税的收支出纳)。”

办事处初创时,工作人员仅5人,除父亲和县金库主任汪周之外,会计金宪荣和出纳周玉书两人同时兼任柜台业务,又雇用大沙堤人金阿普为行警,企业初具雏形。

面临日寇铁蹄的两次艰难撤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那年27岁。在这场民族的大浩劫中,在家与国、公与私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交出了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显示出异乎常人的镇定与勇敢。

1941年,瑞安“四一九”事变沦陷的前数天,父亲一直在银行里率领下属做应变的准备工作,包括遣散多余人员,组织撤退队伍,把历年文档资料打包运往松阳、泰顺等地的仓库,又将撤退时必须带走的重要物品整理装箱,事先雇好挑夫,忙得顾不上回家。直到4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他才回到范大桥的家里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妻儿,并交待了一些有关问题,随即返回银行,静候局势的变化。

次日凌晨2时许,当他得知日舰已进入飞云江口的消息后,立即率领银行的撤退队伍,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大沙堤向北撤离出城,安全地转移到北门外山上。

这时,瑞安城里早已乱成一片,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夜空,大街小巷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他们携儿带女,哭爹喊娘,相互冲撞,北濠河上的几座小桥被人们挤得摇摇欲坠。我们一家人包括祖父母、母亲、大哥和我,很快在混乱不堪的逃难人群中被挤散了,彼此不知下落。

天亮了,父亲将银行队伍暂作安顿,转身返回寻找自己的家人,终于在约定的牛头岭山脚找到了他们,但唯独不见我和驮我的老仆人。这时的他已经无法顾及寻找我了,赶紧带着家人去和银行队伍会合,以便尽速启程西撤。

为了不影响银行队伍的撤退,也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决定将银行队伍和家人分成两拨,并指定了落脚的地點。据大哥俞雄回忆:在这天撤退的路上,银行这支队伍遇到了某地的国民党驻军。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他们乘机向父亲勒索军饷,这时的父亲因为连续操劳,身体发烧,头上盖着毛巾,躺在一张椅子上,四周团团围着带枪的士兵。父亲坚持原则,软拖硬扛,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终于完好保住了银行的财产,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只装有少量现钞的皮包却被兵痞们抢走了。

在往西撤退的路上,听说陶山方向已经出现日本兵,他意识到自己带的这支银行队伍必须尽快脱离日军的

包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当机立断,改变从陶山过江的既定路线,决定提早在潘岱渡江到仙降,再经马屿、平阳坑去文成的百丈口。当晚,银行撤退队伍和我们都来到潘岱廿四都这个小地方,歇脚过夜。我们一家人寄宿在亲戚碎公家里,父亲秘密安顿好银行队伍后,也只身来到碎公家和我们见面。

当晚,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深夜时分,一阵粗暴的砸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我,和衣而卧的父亲警觉地翻身而起,迅速带领我们母子仁躲进了屋后牛栏间的稻草堆中,同时紧捂我的口,不让出一点声响。在黑暗中我们只听得前屋有许多人在走动,拍桌声,责骂声,哀求声,吵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平静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的是一群脸上涂墨、手持凶器的不速之客,是专门来找我父亲要钱的。幸亏我们藏得严实,没有被发现,加上碎公一家的多方劝解和破费,终于逃过了这一劫。

次日凌晨,一夜未曾合眼的父亲,头脑依然清晰,他决定兵分两路,留下祖父母等在碎公家里暂住,自己带领银行队伍和我们娘儿仨立即雇船渡江。为了不影响队伍的行进速度,特地找了两只大箩筐,把我们兄弟俩一人一筐装了,让挑夫挑了跟在队伍后头。

战乱中的童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颠沛流离”的滋味。

父亲晚年病重时,曾应我的请求,留下以下文字,记录了上述经历:

“1941年4月18日午夜,瑞安城首次被日寇侵略。我率行内人员分批装运现钞、帐册、枪支、文件等,急速运出北门外山上,观望情况。这件事不但有被包围失陷的危险,还有民族气节问题,于是决定连夜退离包围圈,走陶山出去。不料陶山方面也有日兵出现,只有渡江,经过马屿、平阳坑、高楼,直上百丈口。在那里留听消息一星期,待闻日寇已退出,方安全返回瑞安。”

抗日战争期间,瑞安城先后多次受到日机的侵扰和狂轰滥炸,大沙巷是重灾区,父亲以身作则,坚守岗位,始终未离开银行一步。1942年第二次沦陷时,父亲再次率领银行队伍,长途跋涉,撤退至平阳县水头镇,保护了银行资产安全无恙。

在抗战烽火岁月中诞生成长的瑞安银行业——追忆我们的父亲俞象川创建瑞安地方银行往事

■俞海

在瑞安大沙堤历史文化街区,一座历经风雨的三层楼静静地诉说着往昔。它不仅是网红打卡点,更是瑞安现代金融业的重要发祥地。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字紧密相连——俞象川。今年,恰逢瑞安银行业诞生90周年,笔者回溯那段烽火岁月,重温父亲俞象川筚路蓝缕、创办瑞安地方银行的往事,既是对一段城市记忆的打捞,也是对一种敬业报国精神的致敬。



扫一扫,看电子版



俞象川创建的瑞安地方银行现在是大沙堤历史文化街区的网红打卡点

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服务民生服务抗战

办事处开始营业时,没有固定的资金,全靠以收抵支,透支部分报省行温州支行拨款弥补。在资金奇缺的情况下,他积极联络各界人士,多方拓宽经营渠道。

次年,办事处根据农民需要,增设了“青苗贷款”和“农产品封仓保管放款”两项业务,受到农民的欢迎。不久后,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又在塘下、海安、仙降、林垵和陶山等五地,分别建立农贷网点,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主持其事。此前,父亲写有一篇《瑞安农村经济调查》的报告,内容涉及瑞安江南、陶山一带的甘蔗种植,马屿的奶牛饲养,湖岭的手工造纸、榨油等,可见他对拓宽银行业务有过深入思考,事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办事处成立后,业务蒸蒸日上,原有营业场地已远远无法适应,父亲以他精明的商人目光,看中大沙巷口一排被大火烧毁的临街房屋,便主动与其中一位名叫胡颖麟的房东联系,建议他以每月租金30银元的价格出租给办事处,由办事处出资拆建使用,以租抵典,各获其利。在拆建过程中,父亲还精心设计了一个钢筋混凝土库房,并向有名的瑞安毓蒙铁工厂订做库房铁门。

这座建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西合璧式楼房,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瑞安中国人民银行诞生之地,成为瑞安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也成为现今瑞安大沙堤历史文化街区的网红打卡点。

据《民国瑞安县志》记载:1935年,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处吸收社会存款总数计国币1596万元;贷款总数达国币2286万元;柜台营业额达7774万元。到了1941年,以上三项指标分别上升到6530万元、8834万元和31073万元,六年时间里增长了4倍以上。

由于瑞安办事处各项工作卓有成效,省行决定从1941年起,将经营业务陷入困境的瑞安县合作金库并入瑞安办事处,由父亲兼任县合作金库理事会主席、县合作农贷理事会主席。是年,瑞安县商会成立,父亲当选为第一届理事,跻身本县工商界知名人士之列。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影响,市场萎缩,经济萧条,但瑞安办事处的业务却始终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这和我父亲的领导有方不无关系。几年来,办事处不但新建了营业大楼,还增添了会客室、厨房和食堂,甚至还安排了几间职工宿舍,行员也一度达到31人之多。为了银行今后的发展,

父亲还通过招收学徒的办法,亲自帮带、培养了鲍瑞林、董椿、蔡文松、陈大任等青年职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成为瑞安首批出色的财会人员,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做出有益贡献。

多年后,我在研究父亲的事迹时,曾在瑞安档案馆里找到一本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瑞安办事处移交清册》,这是他任职的有力证据。清册的图记部分还显示,父亲当时还有一个外人所不知的重要职务:浙江地方银行瑞安信托处主任。这个信托处隶属于中央信托局,是中央银行的直属金融机构,负责各种战时资源的安全和畅通运行,在保护沦陷区机关、学校、工厂的撤退,以及安定后方生产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1942年,由于瑞安办事处业绩突出,省行正在酝酿将其升级为支行。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意外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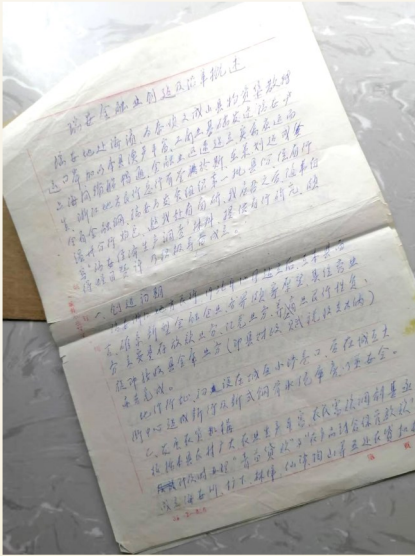
父亲晚年在病榻上为我讲述这件从未给别人讲过的经历时,令我为之愤怒不平,扼腕叹息不已!

他说:“有一天,办事处接到温州分行传达省行的密电,告知中央银行发行的七板券钞票立即收缴上交,而且必须在当天营业时间里收兑完毕,不许延期使用。消息公示后,前来银行兑换七板券钞票的群众很多,柜台前拥挤不堪。我看这么多的人,营业时间肯定不够,就电告温行领导,要求延长营业时间,但始终不被允许。最后,我不忍群众手中的钞票过期作废,就自作主张,将营业时间拖长了几个小时,直到来兑换钞票的群众走完为止。事后,有人密告上头,为此,我受到上司的严厉训斥。不久,就被省行点调为海门办事处主任,其实是明调暗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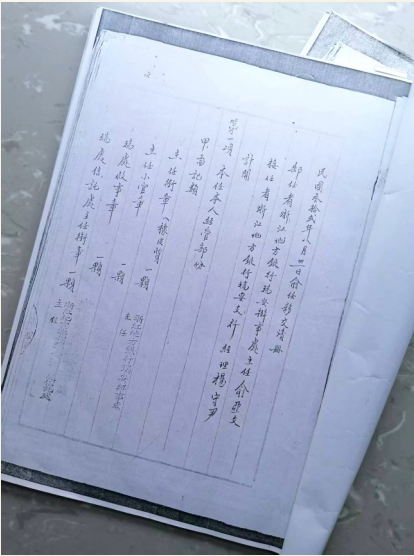
又说:“我在瑞安银行任职八年,感情很深,离开时不无留恋之意。”

1943年秋天,父亲认真负责地办好瑞安办事处的移交工作后,便回到我们借住的海安蒋家休息。那年我八岁,在场桥盐工子弟学校念书,这是我童年时代和父亲相处日子最长的一次。父亲疲惫的身心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很快得到恢复,他会讲故事,唱京戏,唱得最多的是《四郎探母》里的那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他还教我唱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拂开岁月尘埃,还原历史面目,谨以此文献给瑞安银行业诞生90周年和为此鞠躬尽瘁的父亲!



俞象川《瑞安金融业创建及沿革概述》手迹



《浙江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处移交清册》首页